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立新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  
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

王立新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  
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  
王立新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5印张 2插页 368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1-02458-2/K·325

定 价:22.00元

---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Wang Lix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a's society experienced rapid changes, many of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were active in variou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works such as running schools and newspapers and publishing books in order to spread the Gospel, re-order China's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ol China's reform. Their work introduced modern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and thus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transmitted scientific knowledge, modern values and Western customs into China. Their influence became a threat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stimulated 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 of the need for reform among the literati. Christian school and press media run by missionaries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for-

mation of modern values and ideology in the literati, their dissociation from Confucian-based orthodoxy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reform-minded intellectual groups. Moreover, some missionaries had a hand i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put forward some programs Chinese reformers could learn from and even follow.

Nevertheless, what American did was in some aspect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al goal of Chinese modernizers. They participated in China's reform movement and designed the wa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goals and interes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Western World. They hoped that missionaries and Westerners w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Some work they did went against the will of Chinese people and violated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Their cultural level, religious and racial prejudice and utilitarian goal for evangelization diminished the value and advantage of their activities to the progress of China. History has shown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as unlikely to follow the pattern designed by missionaries and will be realized only after the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progressive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independent choice and with the initiative in their own hands.

# 序 言

## 杨生茂

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是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中最为显著的渠道，因此本书作者所申论的内容，是当今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之一。近年国内举行过多次关于美国在华教会学校的研讨会。美国教会组织也曾差人来华搜集有关教会学校的文字或口述资料。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学者也写出了若干关于美国传教会在华文教活动的专著。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有些留学美国的学生回国收集老一代留学生的经历。当然他们所收集的资料和访问的对象，不局限于教会学校毕业生，但老一代的留学生中从教会学校出身的为数不少。以上学术研究活动正表明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美文化关系史上据有的一席之地。

这种研究既然是“热门话题”，自然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认识的程度不同，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在评价问题上时有分歧。众说纷纭，是好现象，如此方能接近比较合乎实际的想法。应该说，本书作者所作的努力，也

是试图应答“热门话题”的。

作者在图书馆中拂尘披览了许多近代来华美国传教士的中西文论著，在资料收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着力勾勒了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方面，并结合他们传布“福音”的言行，提出了既有见地，又恰如其分的看法，评鹭珠玑，散落全书。

我们不可简单地把美国传教士在华布道活动视为纯宗教活动。他们的活动始终与政治、经济同步并进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三位”结为“一体”，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都是为美国向外扩张这个总趋势服务的，直是美国扩张主义“齐下”的“三管”。

在18世纪末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多有贬词，已不同于启蒙运动时期所表达的赞誉之意。美国开国元勋们对于中国不大了解，他们是通过西欧知晓中国的。虽然他们中间有人向往中国，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示过访问中国的意愿，但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是遥远不清的。及至19世纪，美国传教士来华并非个人的行动，甚而不是出自个人的意愿，而主要是由教会差遣的。当他们来华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开始衰落，并在外国人的进击下节节败退，不得不俯仰由人。1804年美国商人首次从土耳其贩来鸦片，中美贸易开始逐渐发生质变。1844年望厦条约的订立正是这种质变的具体表现。这就是美国传教士来华传布“福音”时所处的大时代背景。

作者在全书之末提出了带有评估性的“误导论”，这个总结正是从当时大时代背景出发的。传教士引来的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启了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眼界。这无疑较封建思想是先进的,并可成为近代中国人选择和借鉴的内容,对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也不无促进作用。但在目的和方式上,传教士并不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他们只能通过“福音化”达到西方化,而西方化绝不等于现代化。1995年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所著《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写道,“亚洲现代化不等于亚洲西方化”。其实,反置其意,同样确切。近代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无需絮谈。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国传教士往往同传入对象国抵抗现代化的封建顽固势力联袂而行,二是传教运动的进程与传入对象国本体所产生的社会原动力格格不入。

时至今日,美国有个中国学学者居然还说什么凡当中国符合美国文化价值观和模式时,中美关系则发展顺利,反之,则困难重重。可见,这种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说法仍未绝唱。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想到“全盘西化论”的危害性。关于这种主张,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引发一场大辩论,但至今有些人仍不能明白底里,未能作到泾渭分明。我们认为,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顽固民粹主义以及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灰色虚无主义一样,全盘西化论也是蒙昧的表现。对待外来文化,我们应采取鉴别筛选,择优而从的态度,既不能一股脑地加以否定,又不应该不加区别地盲目吸收。同时对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应慎重反思,剔除其沉渣糟粕,发展其优秀素质。但反思不是故作反面文章,而是创造鉴别吸收外来文化优秀部分的内在条件,二者相辅相承,互为补充。同



时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使两川归大海。这都是为了抵制外来文化中蓄意制造思想附庸的破坏力量,宏扬光大本国悠久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而丰富世界文化。做到这两点,才能成为有见识、有脊梁的清醒的文化人。但此举绝不是轻易之事,我们必须付出艰巨的努力。晚清士大夫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而今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做到这点。这也许就是作者在书末总结中要表达的潜台词罢。我觉得,应当从这个高度去品评和审视这本著作。

一九九六年三月  
于南开园澹泊惜阴斋

# 导 言

尽管对什么是现代化学术界迄今尚无一致的说法,但应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史正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现代化理论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modern)不同于中国史学界历史分期中的“现代”,它泛指中世纪结束以来直至今天不断发展的历史时期。“现代”也可以作为价值观念,特指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兴起的区别于中世纪的新的时代精神和特征,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和特征通常也被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含有以上两层涵义,但多指后一层涵义。<sup>[1]</sup>

现代化作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开始的全球所有国家必然经历的普遍发展过程,其表现形式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多种多样的。事实上各个国家也已经或正在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正如美国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C·布莱克所言:“现代化的过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导致一种趋同状态,或者说会导致一种功能的普遍化”,但却“不

可能导向体制的普遍化”，各国“在功能上变得越来越相似，但在体制结构上却没有出现相应的趋同现象。它们要做的事情越来越相似，但它们做事情的方式在一些重要方面仍大不相同”。<sup>(2)</sup>

不过，尽管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可能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也可能是有差异的，但这不等于否认现代化有其特定的和确切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来源于现代性本身，因而并不随着发展道路和表现形式的差异而有所变化。现代化从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这一转变涉及到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教育、科技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无论是在作为现代化发源地的西方还是后发现代化的非西方各国，现代化都应包括如下基本内容：（一）经济上的工业化，指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二）政治上的民主化，指一个以大众参与、人民自治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代替少数人垄断政权的专制制度的过程；（三）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上反对神权和王权，肯定个人价值，尊重人权，崇尚自由与平等。现代化的这些本质涵义当然也适用于晚清中国争取现代化的进程。

一般来说，工业化在现代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这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尤其如此。工业化为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然而这一特点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中国历史自然发展

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被迫兴起的,因此,思想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始终有赖于思想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转变为其开辟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是从思想上承认自己不足开始的。正如香港学者金耀基所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士大夫集团“自愿或不自愿地承认中国文化之‘不足’,以及西方文化有‘胜于’中国者,基于这一种心态的转变,‘现代化’的工作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sup>(3)</sup>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虽然是主要的,但“现代化的心理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sup>(4)</sup>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导和关键。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

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即使传统社会中的人群转变成具有现代意识和观念的人群。近代历史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发展到晚清已不适用于近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守旧士大夫反对变革的思想武器,但是传统文化不一定会成为它的负载者接受新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从社会化角度来看,有利的环境因素可以使传统社会中的人群走向现代化。有利的环境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现代教育、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关的职业和其它现代化职业,其中通过再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接受近代知识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首位实质性步骤”。<sup>(5)</sup>传教士是近代中国西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开拓者,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是在相对意义上使用“现代化”一词,认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每一个步骤,近代先进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和心理等方面不断摆脱传统势力的影响,不断追求变革以及为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国家富强做出的文化选择都具有近代意义。因此,本书把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中国近代新学的崛起和传统教育的变革都看作晚清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环节和内容。

## 二

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的启动,首先在于“现代性的挑战”,即现代知识与观念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受到了挑战,这样,“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现代性的倡导者出现了”。<sup>[6]</sup>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的挑战主要并非源于中国社会内部而是来源于西方,是一种“外发的压力”,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侵略之下被迫兴起的。无论是西方学术界的“冲击——反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中国中心观”,<sup>[7]</sup>还是我国学者的“内因——外因结合论”<sup>[8]</sup>都承认这一点,其分歧仅仅在于西方影响的程度和性

质。布莱克把这种源于外发压力的现代化称为“防卫的现代化”(defensive modernization)。<sup>(9)</sup>

“外发的压力”或者说西方的入侵给中国社会造成双重的后果,对晚清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

西方入侵的第一个影响是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西方的入侵为中国的现代化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剥夺以及竭力“依靠并强化传统领袖和体制来维持现状”,即扶植和支持对其有利的封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sup>(10)</sup>经济上勒索大量的赔款和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思想文化上散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毒素,等等。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还在于西方列强“只想按其自身的需要,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将现代化的利益推广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并不愿意看到一种彻底的现代化,因为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被统治者的独立,并使统治者丧失本来可以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种种好处”。<sup>(11)</sup>因此,“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自治还是经受着拖延的殖民统治”是关系到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sup>(12)</sup>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另一个后果则在于诱发了中国人为摆脱受奴役和半殖民地地位而开始谋求现代化的进程,并以新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魅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可以效仿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13)</sup>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侵略,实质则是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挑战,是西方价值观对

中国价值观的挑战。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与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的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将闭关自守的中国从睡梦中惊醒，驱动了中国社会内部要求变革的政治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初目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继而通过引进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来改造中国社会。西方入侵的这一后果并非入侵者的主观愿望，而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作为西方势力一部分的传教士正是在这双重背景下与晚清中国的现代化发生联系的。

### 三

然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不是仅仅源于他们与外交官和商人一样，是西方势力的一部分呢？回答是否定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传教士来华的特殊使命和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身份特征。

与外交官和商人不同的是，传教士来华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获取物质利益和谋求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用基督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文化。这一目标背后的殖民主义渊源使传教士在近代早期参与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但传教士声称，他们并不以此为满

足,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真正使命,他们的真正使命是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以及与信仰相关联的所有的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即整个生活方式。他们狂热地认为,只有用西方基督教文化彻底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才能完成其传教使命。传教士的这种精神和文化追求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外交官和商人的不同之处。

在整个19世纪,传教士企图改造中国的主要工具是包裹着基督教外衣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基督教化的西学。他们看到西学是变革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试图把基督教夹杂在西学中兜售,通过使中国西方化最终达到使中国“福音化”的目的。传教士传播西学主要是通过设立学校、出版书籍和主办报刊来实现的。美国传教士正是通过这些社会文化活动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并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事业发生密切关系的。

传教士选择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是基于传教需要对中国社会变化做出的反应。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整个世界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科学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传教士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历史潮流的必然性。基于西方历史上科学被用来反对宗教的沉痛教训,以及对“脱离基督教的西方文化”有可能“大大加剧无节制的罪恶”和“道德堕落”的深刻认识,<sup>[4]</sup>传教士要控制它,承担起西学传播的责任。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对此曾有过一番阐述:

“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它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一不可抗拒的势力



必将遍及全中国。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正在探索和渴望学习使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中国，直至最偏远的角落。基督教传教士为什么要努力培养在这场中国注定要出现的伟大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有两个充分的理由。一是这一潮流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它将在物质、社会和政治方面给中国带来无数好处，更何况这场潮流带来的科学与艺术将有效地消除异教迷信，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的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大道。这引出第二个原因，如果虔诚的人和基督徒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潮流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和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学、艺术和物质的改善就将落入基督教的敌人手中，被用来作为阻碍真理和正义发展的强大武器，科学不是宗教的盟友，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既能以基督教真理来影响又能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这也是使西方科学和文明迅速在中国生根的伟大时机。因此基督教传教士是最好的人选，他们有才能，受过教育，有事业心，最适于培养和从事上述工作所需要的人才。我认为，在此情况下，传教士不仅要培养宣道师，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和工匠等等，这是他们的责任和特权。难道教会能仅仅因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使者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受到贬低和失去宗教特点，而允许魔鬼来培养人和借用西方伟大的基督教文明的机器，并对他在中国散布怀疑主义和反宗教思想而无动于衷吗？不！要让教会以自己的胆识和能力来控制这场即将到来的潮流，并通过培养合适的代理人保证其在基督教的指导和影